

“本命”怎么来的？生肖是外来的吗？

元旦已过，春节将至，兔年将转为龙年。值此之际，有必要对生肖文化进行沟沉、解读，推进科普。

生肖应是“中国造”

生肖始于何时、其源如何，至今争论不休，据学者张珊珊的《生肖文化的起源及其发展过程》，大体分为“本土说”和“外来说”。

“本土说”粗分为四种，即“源于图腾说”“源于天文说”“源于农耕说”和“源于祭祀说”。

“源于图腾说”认为生肖是各部落的图腾，清代学者顾炎武称，春秋仅22姓，学者董家遵进一步指出，22姓是从12姓分化而来，每姓一兽，合成十二生肖；“源于天文说”则认为，十二生肖与太阳、月亮的运行规律有关，但著名学者李零认为不可信；“源于农耕说”认为生肖多是农耕用畜类，用它们纪年较直观、方便，此说无证据，且龙、虎非农耕所宜；“源于祭祀说”认为马牛羊等是祭品，或据古人不同时间设祭用牲不同而来，可龙、虎是受祭对象，非祭品。

“外来说”可粗分为两种，即“源于印度说”“源于古巴比伦说”。

“源于印度说”认为，公元前3世纪，阿育王统一印度，力推佛教，并向中亚、西亚派出僧侣，以鼠为首，设十二神兽轮流值岁，巡行阎浮提（即南瞻部洲，位于南方，被海洋环绕，是佛教中人类的主要居住地），此说被游牧民族接受，匈奴使用12兽纪年，汉墓中“龙虎斗”图有抗匈奴之意；“源于古巴比伦说”是著名学者郭沫若提出，称十二生肖源于古巴比伦黄道十二宫神像，后传至中亚，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。

随着考古发现，可知至少在秦朝已有生肖，“外来说”的论据不足，“本土说”更具说服力，但中国的生肖文化中也吸收了外来文化。

“十日并出”是谣传

生肖源于纪时，古人最早纪时方式是天干，与太阳运转有关。

学者上师文指出，商朝帝王多用天干命名，如上甲微、报丁、报乙、太丁、仲壬、太甲、沃丁、太庚、小甲、雍己、太戊、仲丁、外壬、祖乙、祖辛、帝乙、帝辛等，但上甲微之前，7帝王未用天干，即：契、昭明、相土、昌若、曹圉、冥、振。

学者贾雯鹤先生认为，其中隐含着商人的太阳崇拜：从契到振，其实是太阳循环运转的全过程。契是玄王，即“黑夜之神”，古人认为，夜晚时，太阳在地下运行，黎明时重新升起，而契的儿子是昭明，昭明即光明，犹日出于夜，而太阳运转一周后，复归于冥，继而又振。

振以后，商人简化记录方式，按10个太阳轮流巡回顺序记录。在《山海经》中，有这样的记录：“下有汤谷。汤谷上有扶桑，十日所浴，在黑齿北。居水中，有大木，九日居下枝，一日居上枝。”商朝的每个帝王相当于十日中的一个，次第坐庄。并设占星之官羲和，记录太阳运行状况，是为天干，即“始作甲乙以明日，谓之干”。

朱熹曾说：“此十日，本是自甲至癸耳，而传者强以为十日并出之说。”认为古代“十日并出”是不懂历法而生的谣传。“十日并出”出自后羿射日的传说，后羿是挑战夏王朝的一个部落，编造此说或为发动叛乱。夏朝和商朝一样，也信仰太阳。

天干以10天为一循环，称一旬。纪日之外，另有纪月，即地支。地支晚于天干，或是上古两大部族合并，

彼此纪时方式不同，勉强并为干支纪年（即天干加地支）。

王充不信生肖说

东汉元和二年（85年），以政令方式，在全国实行干支纪年，十二生肖纪年得以推广。

对于生肖背后的“深意”，东汉学者王充嗤之以鼻，他在《论衡》中批驳：“水胜火，鼠何不逐马？金胜木，鸡何不啄兔？亥，豕也，未，羊也，丑，牛也；土胜水，牛羊何不杀豕？巳，蛇也，申，猴也；火胜金，蛇何不食猕猴？猕猴者，畏鼠也，啮猕猴者，犬也。鼠，水也，猕猴，金也；水不胜金，猕猴何故畏鼠也？戌，土也，申，猴也；土不胜金，猴何故畏犬？”

王充依据五行学说，直斥其与十二生肖之间的矛盾。学者上师文认为，此时世风多据属相论人，“言属鼠人则狡黠智慧，言属牛人则勤恳老实”，又以两人生肖来判断相互关系，“言属鼠人与属马人相冲，属鼠人与属兔人相刑，属鼠人与属羊人相害”。太岁信仰也很流行。

太岁本指木星，它每12年循环一圈，易观测，古人遂用它代地支。地支穴准确，一个月亮年约为354天，而一个地球年是365.24年，彼此难对应。木星运转相对规律，屈原在《离骚》中写道：“摄提贞于孟陬兮，惟庚寅以降。”即观测木星形成的结果。

为确定具体时间，古人将木星运行轨道分成12份，称：困敦、赤奋若、摄提格、单阏、执徐、大荒落、敦牂、协洽、涒滩、作噩、阉茂、大渊献。

为判断木星运行的具体位置，主要依据该区域有什么星，木星进入哪区，便以此区最大星命名，而用来定位的星称“岁星”。可随着观测积累，问题出现了：木星的运转周

期不是12年，而是11.86年。

皇帝不敢走正门

据学者上师文钩沉，为弥补木星运转周期非整数年的“缺陷”，古人臆想出实际观测不到的“太岁星”，一周天整12年，且与木星运行方向相反（木星运行方向和纪月相反，计算时较麻烦）。

这种不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想象，易人演绎逻辑的窠臼，能整合旧知识，难产生新知识，反而强化了本命信仰等迷信。唐代皇家冒充李耳（老子）后裔，大建道观，道教信仰盛行，且受佛教影响，生肖塑像从传统的动物造型，转为兽首人身，进一步神格化，本命迷信更加泛滥。

天宝元年，李适之任相，李林甫对他说：“华山有金矿，采之可以富国，上未之知。”李适之性粗疏，直接向唐玄宗汇报，唐玄宗大喜，问李林甫，李林甫说：“我早就知道，但华山是您的本命山，王气所在，不可穿凿，臣故不敢上言。”唐玄宗从此鄙薄李适之。

唐玄宗属鸡，性喜斗鸡，以致“上之好之，民风尤甚。诸王世家、外戚家、贵主家、侯家倾破产市鸡，以饷鸡直。都中男女，以弄鸡为事，贫者弄假鸡”。

皇帝被本命信仰迷惑，百姓亦然，据《太平广记》：开元末，有人好食羊头者，常晨出。有怪在门焉。羊头人身，衣冠甚伟。告其人曰：“吾未之神也，其属在羊。吾以汝好食羊头，故来求汝，极食则已，若不尔，吾将杀之。”其人大惧，遂不复食。

在《酉阳杂记》中，记录了大量类似的荒唐故事，属鼠不捕鼠，属兔不食兔，唐代宗死后，唐德宗继位，送葬竟只敢走偏门，不敢走正南门（方位属午），因他的本命属午（马）。

招兵竟要看属相

本命是人编出来的说辞，却扭曲了人的行为，因古人无科学意识，面对未知，常“有用即真理，不求甚解”。包括王充，他一边讽刺生肖迷信，一边又表示：“国命系于众星，列宿吉凶，国有祸福；众星推移，人有盛衰。……至于富贵所禀，犹性所禀之气，得众星之精。……天有百官，有众星，天施气而众星布精，天所施气，众星之气在其中矣。人禀气而生，含气而长，得贵则贵，得贱则贱。贵或秩有高下，富或货有多少，皆星位尊卑大小之所授也。”

面对社会问题，应多元包容；面对科学问题，则应穷追本源。世界是复杂的，须有复杂的应对手段，搞清问题域，匹配以正确方法，可传统封建王朝恰恰最缺多元化能力。

据学者上师文钩沉，唐代皇帝常设道场护本命，宋代更甚，几乎所有皇帝都设道场，建本命元辰殿（两宋共建25处，供奉皇帝本命）。该俗甚至传至辽金，今北京白云观“丁卯瑞圣殿”即金显宗孝懿皇后的本命元辰殿。

明武宗为避本命，且姓朱，竟禁民间屠宰，“本犯连当房家小发遣极边卫”，甚至抗倭名将戚继光在《练兵实纪》都表示：“凡上官赴任等事，先看作主之人本命元犯冲克，然后选用。”意思是，指挥官招兵须看属相，有冲克者弃而不用。

到清代，本命信仰成年节仪式，据富察敦崇的《燕京岁时记》：“初八日，黄昏之后，以纸蘸油，燃灯一百零八盏，焚香而祀之，谓之顺星。”顺星即祈求本命星神保佑。

生肖与本命是传统文化，善用可解颐增趣，过甚言之，则有大害。
蔡辉《北京晚报》

抬棺出征的孤勇者：左宗棠为何能收复新疆？

1880年5月的一天，一位年近七旬的统帅骑马离开肃州（今酒泉市）向西前进，跟在他身后的是一队整齐进军的骑、步兵。在队伍中，一辆马车格外引人注目，上面赫然拉着一口厚重的黑色棺材。这位抬棺出征的统帅就是清政府委任的钦差大臣、陕甘总督左宗棠。他此行出征的目标是收复被沙俄侵占多年的新疆伊犁。

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 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

时间回到1865年，毗邻中国西北边疆的浩罕汗国（今乌兹别克斯坦）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，占领了包括喀什噶尔、和阗、阿克苏在内的南疆地区以及迪化（今乌鲁木齐）、吐鲁番等地。

与此同时，恰逢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不久，沙俄和英国的竞争焦点转向亚洲。处于亚欧腹地、被形象地称为“亚洲枢纽”“亚洲心脏”的新疆，在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愈加凸显。获悉阿古柏入侵新疆后，沙俄和英国都意识到这是扩大势力范围的重大机遇，因此两国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阿古柏。沙俄以“代管”和保护侨民为借口侵占伊犁地区，并扬言攻占迪化（今乌鲁木齐）。英国则妄图在新疆成立一个隔绝沙俄势力的“缓冲国”。阿古柏在沙俄和英国的支持下建立了伪政权，中国西北边疆局势岌岌可危。以李鸿章为代表

的朝臣主张听从英国的建议，承认阿古柏侵占新疆的既成事实，集中国力专心海防，在某种程度上有放弃新疆的意味。得知这种情况，左宗棠心急如焚。他如孤勇者般挺身而出，力陈放弃新疆是自挫国威的短视行为，助长西方列强嚣张气焰，必将遗患长远。他陈述“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，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”的利害关系，最终打动了清朝最高统治者。

清政府由此定下了“海防”“塞防”并重的战略，于1875年任命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，督办新疆军务。

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难于筹粮

新疆地域广大，今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面积为166万平方公里，占我国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。这里有众多的草原、河流，也有连片的沙漠戈壁。南疆地区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面积为33万平方公里，是我国最

大的沙漠，也是世界第十大沙漠，被誉为“死亡之海”。今天，我国已建成三条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公路。但在19世纪70年代，西征军绝无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可能。面对新疆复杂的地势，先收复北疆势在必行。收复新疆之战的关键在于解决补给问题。西北用兵，“筹饷难于筹兵，筹粮难于筹饷，筹转运难于筹粮”。从甘肃到新疆路途遥远，必须提前筹划好进军和补给路线，保证粮饷供应充足才有望获得胜利。现在，从甘肃酒泉到新疆东大门哈密，开车走连霍（连云港到霍尔果斯）高速，全程共计632公里，最快需要7个半小时。当时西征军的主要运输工具是马、骡子和骆驼等畜力，以这样的运输条件供应几万大军的吃穿用度，补给的难度可想而知。

随着西征军的不断深入，这条补给线会越来越长。因此，左宗棠实施精兵策略，裁撤军队中的冗员，鼓励他们就地发展生产，保障军队供给。

先北后南缓进急战

左宗棠坐镇甘肃肃州（今酒泉市），根据新疆地势情况制定了“先北后南”“缓进急战”两条基本作战方针。1876年，在粮草、武器准备充足的情况下，左宗棠命令刘锦棠、金顺兵分两路率军出关入疆。为了利用沙俄和英国之间的矛盾，左宗棠决定暂不直接收复伊犁地区，而是

集中兵力消灭阿古柏建立的伪政权。西征军在古牧地（今米泉）、迪化和玛纳斯等地与敌军英勇奋战，狠狠挫败了敌军的锋芒，把上述地区一一收复。在收复迪化的战事中，清军在六道湾山梁上架起大炮，一炮即轰塌了一处城墙，敌军顿时大溃，清军一鼓作气迅速进城。今天，乌鲁木齐水磨沟区重建的“一炮成功”广场就是为了纪念当时的那段历史。

随后，西征军攻占了通往南疆的军事要地达坂城，收复了托克逊和吐鲁番，彻底打开了南疆通道。

至1878年1月，西征军已先后攻克库尔勒、库车、阿克苏、乌什、喀什噶尔、叶尔羌和和阗等地，这标志着新疆除伊犁外的地区大体被收复。

从一开始进军到驱逐侵略者，整个军事行动历时一年半时间，但实际作战时间只有不到八个月。在道路交通和补给等各种困难条件下，进展如此神速，真可谓“势如破竹”。

英国历史学家包罗杰（1853—1928）评价，这是一支由中国人领导的中国军队所曾取得的最光辉的成就”。

抬棺出征收复伊犁

在收复新疆大部后，伊犁地区成为清政府和沙俄关注的焦点。

1871年，沙俄料定清政府无法收复新疆，因此在出兵强占伊犁时曾向清政府表示，等清政府收复迪化、玛纳斯等城后，就会将伊犁交还

给清政府。

左宗棠的迅速进军打破了沙俄妄图长期侵占伊犁的美梦，将沙俄逼到了谈判桌前。但清政府代表崇厚十分无能，擅自与沙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里瓦几亚条约》。按照条约规定，清政府除了要赔偿沙俄500万卢布“收回”几座空城外，还要丧失伊犁地区的大片领土。

清政府对崇厚擅自答应对方条件的行为十分不满。在派出曾纪泽到俄国继续谈判的同时，清政府也密令左宗棠做好军事收复伊犁的准备，这才有了左宗棠抬棺出征的一幕。左宗棠不畏强敌，豪情万丈，用“壮士长歌，不复以出塞为苦也，老怀益壮”表达了坚决收复伊犁的决心。

左宗棠的行动震慑了沙俄。经过艰难谈判，中俄双方于1881年签订《中俄改定条约》。此条约虽然也是不平等条约，但较之前崇厚签订的协议，已经在最大程度上维护了国家的权益，伊犁最终回到祖国的怀抱。

林则徐晚年曾路过长沙，与布衣秀才左宗棠有一次彻夜长谈，史称“湘江夜话”（也称“星沙夜话”）。林则徐对青年左宗棠十分器重，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宝贵资料全部交付给他，并寄予厚望：“东南洋夷，能御之者或有人；西定新疆，舍君莫属。”几十年后，左宗棠没有辜负林则徐的期望！
《湖南日报》